

针灸器具沿革及其动因分析与思考

姜姗¹, 张树剑^{2*}, 赵京生³

1.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191

2.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 济南 250355

3.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通过总结针灸器具的沿革与发展历史, 理解其演变的成因, 思考其对针灸技法发展、理论建构、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影响。首先对针灸器具的范畴进行了界定, 并阐述了这一范畴的根据; 汇总了古今针具、灸具的分别使用情况、创新的节点、现代的境况等, 建构了新的论述逻辑; 探索了针灸器具的演变趋势与人们的主动选择, 挖掘了促成这种沿革的客观动因, 反思了针灸器具的变化对“针灸学”本身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思考了中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中的抉择与姿态。

关键词 针具; 灸具; 针灸学; 医学史

古今中外, 人类的所有医治手段大多需要取材于自然, 或创制器具, 或辅助施治。即使是精神疗法, 也需要人为营造的氛围以及具有安慰剂效应的器械或装饰。从宏观上看, 医疗活动借助的外物主要有两类, 一方面是用于内服以调理看不见的体内世界的药物, 千余年来, 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 东西方医者对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以不同的理论逻辑解释这种“看不见”的机理; 另一方面, 则是有着更早起源的在体外施治的器物, 用于对“看得见”的身体进行各种刺激以产生治疗效果。外治法发展至今, 唯东方医学的针术、灸术理论化程度最

高, 学术体系建构最是完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的器械也日益多样与精细, 并已具备相应的规范化制作标准。

对于针灸的早期起源, 虽众说纷纭, 但大体上都是追述到砭石疗法和热熨之术。推至极致, 甚至可在动物的行为中找到类似的主动自我疗愈^[1]。关于针灸术自古至今所使用的器具的罗列与变革, 无论针灸史界还是考古界, 都已做过较为充分的研究工作, 本文除对这些既存史实与实物进行再次梳理和赘述, 更将对“针灸器具”的范畴进行反思与明确, 并通过对针灸器具的演变和革新的动力的思

收稿日期: 2019-04-18; 修回日期: 2019-06-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75)

作者简介: 姜姗, 博士, 研究方向为医学思想史、针灸基础理论, 电子信箱: shanchiang@bjmu.edu.cn; 张树剑(通信作者), 教授, 研究方向为针灸学术史、针灸基础理论, 电子信箱: njrb@163.com

引用格式: 姜姗, 张树剑, 赵京生. 针灸器具沿革及其动因分析与思考[J]. 科技导报, 2019, 37(15): 24-31;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9.15.004

考,来探索背后的医疗器具的技术史,以及这种革新给“针灸学”本身带来的影响。

1 针灸器具的范畴

针灸器具的范畴,是讨论首需界定的命题。“针灸”器具,顾名思义,即在施用针、灸之类的体表刺激法过程中,所使用、借助的工具、材料等。

针术,即以针状物按压、透刺人体皮肤,对体表形成刺激作用,以产生局部或远隔的治疗效果,与针术相关联的器具可以不同的刺激深度进行划分。尽量扩大探讨的器具范围,则包含自远古时期用以切痈排脓、割刺脉管的砭石,到如今针灸临床使用的不同型号的一次性消毒针。

灸术,是通过热熨、药物刺激、或其他与加热相类的方法,同样施用于体表,轻则产生温热除寒的疗效,重亦可以大泻病邪。灸术的实施需两方面器材,一是用于燃灼的材料,一是辅助这一疗法实施的工具。

针术与灸术发展过程中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其代表流派甚至有所冲突,但有时亦相互配合使用。对针术与灸术的歧见,主要由于对两者安全程度的不同看法,这也正是随针具、灸具的沿革演变而起伏的。目前,几乎不会再因安全性而对两者的优劣进行评判,且在温针灸一类的治法中,针与灸和谐相处,共同疗疾(图1)。“针灸器具”则是在针术与灸术,以及两者结合的各类疗法中,医师使用的治疗器具与相关材料。



图1 温针灸(图片来源:乌海市蒙中医院针灸推拿科)

Fig. 1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但在针具的范畴中,仍存在模糊的边界。一般认为,针术始自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通过打磨的石块等来治疗、缓解体表的病痛,但这一“医疗”行为,严格来讲,是两股支流的源头。一股支流是以揩摩按压痛处、反应点来缓解疾病,是后来的针灸、按摩之术的始祖,其发展至汉及汉以后,则有了“以痛为输”“阿是之法”等记载,而着实有效的固定点,则渐渐被理论化,并与脉的概念相联系,形成经脉、腧穴等如今众所周知的理论体系。另一支流则与当今的“微创手术”相似,当然,原始时期限于生活条件、技术水平,是否真的“微创”是难以保证的,但其后随着金属工具的发现和革新,这种局部小型切痈排脓、割疮缓痛的疗法也愈渐精细,并伴随了丰富的文献载述。与这两股支流相应,则发展出了两套治疗工具,到今天,前者包括了各类型号、样式的毫针、梅花针等创伤极小的精细针具,后者则有放血的三棱针、针刀等微创的粗放器具。

2 古今沿革与发展创新

2.1 针具

针具的发展是同源异流的过程。鉴别这两条支流,对回顾、梳理针具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因文字上常统而言之,造成很多误解与混淆,扭曲了理论的发展和对针灸实质的认识。因此,下文将以“针”和“针刀”之名来区别之。

针具的沿革多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具材质的运用与创新,另一方面是针具形态的设计和改造。材质的选用,将直接决定着针体的粗细、软硬,从而影响着针的制作和使用,因此材质的沿革在更大程度上与针的变革并行;而在形态方面,由于针的形态改变无非日益精细,以及长短之别,类似针刀的器具却自《灵枢》的九针之论起即有多样化的雏形,故针具在形态上的沿革更多地体现于针刀的演进过程中。从这两方面分别回溯针具的发展与沿革。

2.1.1 针具材质沿革

针的早期雏形即是用于体表揩摩按压及刺脉的砭石,《说文解字》中有“砭,以石刺病”的描述,在

古代医籍中,亦有关于砭石疗疾的记载,《素问·异法方宜论》将各类治法归于五方,砭石则应于“东方之域”^[2]。砭石的使用应和了石器时代的普遍器具制作材料特点。

对砭石运用的佐证,一方面有如《黄帝内经》等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也有考古挖掘的文物辅证。陶针也与此情况相似,龙山文化遗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土的古代陶针,构成了一些学者对其医治用途的猜想^[3],而《本草纲目》《幼幼集成》等文献中,均有关于“瓷针”刺病的载述^[3]。

但对于草木针、骨针等其他非金属材质的针具,则相对缺乏如此全面的证据。草木针因于无法长期保存,缺乏考古的支持,其使用仅于部分古代文献中有所载述,如《证治准绳》对松针治疗的描述,《儒门事亲》中关于草茎刺血的篇章^[3],均属此类,但从治疗的性质上,实应属下文即将论及的放血之术。而骨针则与之相反,仅存考古实物的暗示,却未见于文献之中,且诸多考古发掘的骨针末端带有针孔,可知其有缝衣之用,故而很难直接证实其医疗用途,这也是在目前医药类出土物品考证中值得推敲之处。

针具发展至《内经》时期,已是金属铸制为主,而具体所采用的金属属性,则与当时的冶炼技术密切相合,故而在出土文物中,有商周青铜针,西汉金、银针^[4],以及其他铁针、铜针等。相对于原始时期的砭石、陶针、骨针等,金属针具更坚固耐用、安全性高、易于造型,其明显的优势使其成为针具的主要制作材料沿用至今。这些属性多样的金属针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其后,针具的制作日渐精细。1953年,承淡安倡导以不锈钢制造针灸针,中国开始出现今天临床上常用的精细、柔韧的不锈钢针灸针,并随着临床消毒标准的提升,推行使用一次性无菌针灸针^[2]。在针具的型号上,日本针灸临床多用极其纤细柔软的金属针,而因于江户时代杉山和一为盲人针灸师发明了管针^[5],并创制管针进针法,沿用至今,使用柔软针体亦能直接进针,不易弯折,是对辅助进针法的重要扩展。

金属针具的沿用使电针的创新成为可能。19世纪初,法国医师提出了使用接通电流的针具的想

法,电针由此诞生,并于20世纪初用于治疗坐骨神经痛,至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进入临床应用^[6]。电针能够加强并延续对施针处的刺激,适应于今天的针灸临床患者多、难以持续施用手法的特点,尤其对于感觉、反应相对麻木的病证更为适宜。

随着现代医用科技的飞速发展,针灸学者也不断创新,将临床上使用的对人体形成刺激作用的媒介,与针术结合,研制了超声针灸、激光针灸、磁针、微波针、水针、穴位贴敷等^[7]。这些以其他介质代替实体针来对腧穴或反应点进行刺激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减缓患者痛苦,从微创到无创的努力探索,体现出针灸与现代医学科学、材料学等领域的创新性融合。

2.1.2 针具形态演变

针具的形态的演变与针具的材质沿革息息相关,材料的不断更新与进步延展了人们对塑形的控制,使制作精细的针具成为可能。也正是塑形、制作水平的提升,早期的针具逐渐分化为前文提及的“针”与“针刀”两大类,相对来说,后者形态的多样更为明显,也是这一部分将重点论及的对象。

如前文所言,原始的刺激媒介主要是砭石,除用于对痛点、反应点的揣摩,其另一重要用途即是切痈排脓、割祛病灶,而这一用途也是后来针刀等粗放器具的原始雏形。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用于揣摩按压的砭石渐向柱状、精细的方向发展,而切痈的砭石则与刀具更为相似,出土的砭石中也多见此类。

《灵枢》应可算作首次对针具进行的系统、理论化的描述。在数术观念的影响下,《灵枢·九针十二原》对九种针具进行了罗列和分别探讨,包括镵针、圆针、鍤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根据《灵枢》的经文描述,以及诸多后人对这九种针具的描画(图2)、复原,不难发现,其中镵针、锋针、铍针、圆利针、大针等五种针具的用途更偏于剧烈的手法,而圆针、鍤针、毫针、长针的使用则更偏柔和。对九针的划分方式颇耐人寻味,经言“九针者,天地之大数,始于一而终于九”,故取九为总和自不必说;而另一方面,《周易·系辞下》中有“阳卦奇,阴卦偶”之说,则五为阳数,四为阴数;联系《黄帝内经》中“补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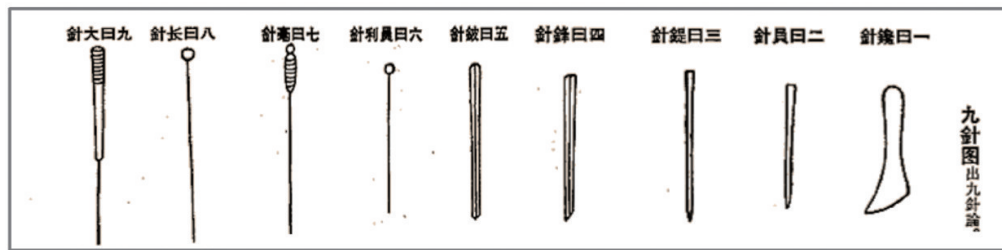


图2 九针图(图片来源:[明]张介宾著《类经图翼》)

Fig. 2 Image of the Nine Needles

方圆”暗含的动阳静阴的思想^[8],此处九针论列5种治疗手段相对激烈的针具,以及4种治疗手段相对柔和的针具,似亦暗藏数术理念于其中。

从九针之论中,可以看到数术等思想观念影响了针具的制造理念,是当时针具形态各异的形上层面的决定因素;而形下的因素,则源于实践应用对针具形状不断革新的直接需求。

放血术在古今中外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把过多的血液或象征某种病因的血液,与疾病的发生进行直接关联,似乎是全人类的通感。《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镞针与锋针,都有刺破皮肤以出血泻邪的功用,而后者发展为三棱针,在今天的针灸临床仍被用作放血泄热排痛的工具。

针刀之术,与古代以砭石、刀具直接切割的“外科”操作有一定血脉关系,到现代,这一概念在狭义上固化为“针刀”(或称“小针刀”)。与传统意义上的针灸术不同,针刀的施术对象并不建构在经脉、腧穴等理论之中,所调理的也并非脉气,而是实体的组织、结构。现代临床中,有了麻醉术的运用,针刀术能够更深入皮肤内部的肌肉、筋节,而患者也不必再承受古人被医治的痛苦。与毫针相似,针刀的研究者也不断开发、结合现代科技,创制了水针刀、超微针刀等^[7]。

除了粗放针具的革新,浅表、轻柔的治疗方式的需求也衍生了许多新型器具,使现代针具的形态更为丰富多样。

同样是放血,三棱针的刺激强度过大,出血量多,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忍受;而梅花针则相对柔和,刺激层面偏于浅表,医者执握富有弹性的针柄以施力,多个针头平均了刺扣的压强,使患者不必感受

过强的疼痛,而达到浅表放血泻邪的效果。

刺激量小的针具使体表长时间留针成为可能。由朱璉先生于1955年发明的T型针,是此类针具的代表性创造^[9]。其后,相似的皮内针经过各种革新,逐渐得到普遍的运用。1978年,日本研发了商品化的揞针,并推广使用,提升了此类微针使用的便捷性。此类长时间局部刺激用具的变体,还有穴位埋线与压丸法,多用于皮肤薄浅的部位。

火与针的结合,从操作上有针尖处烧灼和针尾处烧灼两类,前者指将针尖烧红后,快速点刺皮肤,称火针,直至今天,仍被用于治疗寒疾痛症的强刺激手段,只是因其创伤性大,没有其他温和疗法运用普遍,在源自印度医学的《秘传眼科龙木论》中,被用于治疗眼疾^[4];而在针尾处烧灼,则以温针灸为主,至迟在明代的《明医杂著》中已有记载,是在针尾固定艾炷或其他燃烧物,起到温热熏熨的作用,温针灸在今天的民族医学,如藏医学的实践中,是主要的体表治疗手段^[10]。

古今医者除了使用针状、刀状的器具施行体表疗法外,还有其他的刺激方式,其中使用普遍而自成一家的是拔罐术,是利用负压造成体表局部皮下出血,或经针点刺后利用负压放血的疗法。拔罐,古称“角法”,顾名思义,即使用牛角或其他动物角以多种手段形成负压产生吸拔作用。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关于用角法治疗外痔的记录^[4],其后随着经脉腧穴理论的发展、成熟,吸拔处也由局部病所扩展结合了腧穴所在。随着器具的发展变革,人们使用的器皿从角过渡到陶罐、竹罐、玻璃罐、塑料罐等,不同材质的罐各有相应的形成负压的方法。

2.2 灸具

人类将火运用于医疗行为,当然不止于灸术,但灸术却是先于针术,并与针术相伴一直持续至今日的古代体表疗法之一。灸常被称为“艾灸”,其名称上与“艾”的关联来源于二者在实际运用中的密切关系。《说文解字》中“灸”即“灼”之意;而对于艾的记载更早是对其香气的描述,在古代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艾的记载,《雷公炮炙药性解》中描述其“味苦,性微温无毒,入肝脾二经,主灸百病,温中理气,开郁调经,安胎种子,止崩漏,除久痢,辟鬼邪,定霍乱,生捣汁,理吐衄血。”^[1]

根据有记载的文献来看,灸法的历史早于针法,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都有关于灸疗的记载^[1]。传统的灸法是以火点燃艾绒在体表直接或间接的烧灼,因其操作简便,危险较小,因而与针术相比普适度更高,对施术者的要求也相对宽容,从北宋李唐的《村医图》(又称《灸艾图》)中就可见得古代施用此法时相对随意、简单的条件需求(图3)。



图3 《村医图》(原图收藏于中国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Fig. 3 Painting of a Rural Doctor

如前文所述,灸法的实施所倚赖的器具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用作燃烧材料的灸材,另一类是辅助灸法实施的器具。以下从更为核心的灸材论起。

2.2.1 燃灼材料的多样

艾叶研磨的艾绒是灸法的主要的燃灼材料,除此之外,汉以前所用的蒲绳,晋隋唐使用的蜡、竹茹、硫磺、蔓著子,明清时期的灯心草、阳隧锭等,都是不同时段用以代替艾绒来燃烧的材料^[9]。另有将药物与艾绒混合后卷成艾卷来熏熨的方法,称为“雷火针”“太乙神针”等^[8]。宋金元时期,出现了不需点燃而直接利用药物本身的刺激作用来形成类似艾灸的治疗效果的方法,称“天灸”,天灸常用的材料包括毛茛叶、吴茱萸、斑蝥、白芥子、蓖麻子、甘遂等^[2]。现代研究人员通过改造艾灸条的设计,创制了无烟艾灸^[2],燃烧艾灸产生的大量烟雾,在一定程度上无益于健康,且在现代封闭式治疗环境中施行不便,而无烟艾灸的发明,减少了这种弊端,对医患双方来说,都起到了保护作用,提高了艾灸疗法的适用性与接受度。

古代文献载述了丰富的用于施灸法的燃灼材料,也有关于灸材选择禁忌的记载,《黄帝虾蟆经·辨灸火木法》中有“八木之火以灸,人皆伤血脉肌肉骨髓”的说法,即指不宜用于燃烧作灸材的8种木材,包括松、柏、竹、橘、榆、枳、桑、枣,且每一种“木火”都附有相应的施用之后的所致病状。无论这是纯粹的理论对应,抑或有一定实践基础,但都体现了当时对灸材选择的慎重与对经验的总结。

2.2.2 辅助灸具的发展

论及辅助灸具,需要先明确两种施用灸法的方式,一是直接灸,二是间接灸。顾名思义,两者的区分是以是否直接接触皮肤为标准。直接灸既包括直接将艾炷置于皮肤上点燃,又包括持点燃的艾条按于皮肤表面,因这种灸法常导致施灸部位出现灸疮,故也称“发泡灸”。另一种间接灸法则相对温和,是在艾炷或其他灸材与皮肤之间以某些物体隔开,既不影响热量的传递,亦不会引起直接灼伤与疼痛,在现代针灸临床中,接受程度较高。而辅助灸具,则主要针对配合间接灸法使用的隔离物,或现代创新的器具、器械等。

早期的艾灸大多是较直接地使用艾叶等灸材搓制成形,在体表使用。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制作规整艾炷的艾炷器,内置圆锥空洞,洞下留孔,放入艾绒后,以圆棒插入孔中压实制成^[12]。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了关于使用隔垫避免烧伤的记载,并于后世逐渐丰富,包括隔蒜灸、隔盐灸、隔椒面饼灸、隔附子灸、隔薤灸、隔面饼灸、隔黄土饼灸、隔豆豉饼灸、隔葶苈豆豉饼灸、隔商陆灸、隔杏仁饼灸、隔硫磺蒜饼灸、隔槐皮灸、隔南星饼灸、隔葱灸、隔巴豆饼灸等^[13],此外,还有用瓦甑作为灸具的记载^[2]。这些种类丰富的隔垫物的选用,一方面考虑其操作上的可行性和取材的便捷程度,另一方面也有对其药性的考量,通过在其上燃烧艾绒,可助其药性在皮肤局部的发散与渗透。从散状的艾绒到有相对固定形态的艾炷已是创新,而自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中,灸材形制再一次革新,出现了艾卷,也就是今天临床常见的艾条^[12]。

现代灸法的运用以间接灸为主,因而相关的器具不断创新,设计愈渐精良。传统的艾炷也仍然在使用,据学者统计,现代临床中使用的间接灸隔离物较丰富,其中较高使用频率的有姜、药、蒜、盐^[13]。比间接灸更为稳妥安全的,是各类温灸器、温灸盒,多是木制、金属制的半密闭小盒,内置艾绒或艾条等灸材,置于体表产生熨热效果。此外,亦有一些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仿照艾灸的原理,以红外线、光电等作为加热媒介的尝试,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冻灸疗法^[12],虽然在原则上已经不宜归入灸疗的范畴,但同属于对体表施治的探索。

3 针灸器具变革动因及其对“针灸学”的影响

对于针灸器具的演变过程的追溯,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有侧重的探讨。本文对这些探讨进行梳理、汇总,从中摸索新的演进逻辑,但也并不想止于对纯粹史实的反刍。在对这些历史上、甚至今天使用的针灸器具的陈列中,透过现象的表层,对个中节点与思想动因进行更深的发问。

首先,在这种漫漫承袭、兼有革新的历程中,针

具、灸具都有着怎样的演变趋向?

从历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到针灸器具在近代以前都渐向制作的精良发展,虽有多多样性趋势,但并未出现颠覆性革新,而精良的制作,也就意味着痛苦的减轻、意外的减少;而在近代以后,现代发展中,针具与灸具都有着明显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趋势,出现了多种替代媒介,如电、光、磁等,而传统意义上的金属针具与灸具本身,除了日渐标准化的趋向外,少有翻新。民国以前的沿革更大程度上出于人文的关怀,以后的革新则更偏于向“科学化”的靠拢。

其次,如果说针灸器具的演变趋向透现的是人们的主动选择,那么客观上造就和推动这种沿革的原动力和影响因素又是什么?

第一,最直接而客观的决定因素,即是不同历史阶段决定的生产力水平与器物制造的水准,这一点在早先时期针具的制造上体现格外明显,针具所用材料基本符合当时器物通用材料,而技术水平与精细程度也取决于其时打磨石料、雕刻、冶金、金属铸型等技术的发展状况。第二,客观的自然环境与条件决定了针灸器具的取材,如,药线点灸法多在中国南方地区使用,是壮族文化的传统自然疗法,即以苕麻线在中药中泡制后点燃施灸,在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中,也有类似的因地制宜的方法,如蒙古族的白山蓊绒灸、柁柳灸、纸屑灸、铜灸法、金灸法、银灸法,藏族使用的天竺火灸、汉地火灸、霍尔火灸、烙灸等^[11]。第三,医者对人体的认知程度,以及操作技术需求推动了器具的革新,随着人们对于人体内部结构与生理、病理本质性认识的加深,对针灸器具的安全性及使用规范有了新的标准,不断降低针灸术的风险,亦需要更为精准、安全的器具。第四,从以人为本的层面上,受术者本身也对针灸器具的创新不断提出要求,一方面,人们生活环境、条件的变化,使人体体质也不断发生改变,决定了对外用器具的承受度和接受度的波动,另一方面,针灸适用的疾病谱也在更新,自然导向了部分器具的弃用,并研制新的适宜器具。第五,跨文化、跨国的交流,尤其技术层面交流,促进了针灸器具的翻新,甚至一些新器具在其他国家诞生,并传入

中国,影响着中国针灸器具的演变。

反之,针灸器具自古至今的诸多变化,是否给“针灸学”本身带来了影响?

已有学者探讨了针灸器具的沿革对针刺治疗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这种沿革丰富了针刺治疗的方法,促进了针刺理论的发展,扩大了疾病治疗范围,加强了针刺安全性,促进了无痛针刺治疗的发展^[7]。这种对针灸实践的推动性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针灸学”这一概念,就旨在延展人们观察的范围,包含着针灸治疗活动,但不拘于此。从针灸考古角度看,对针刺器具演变的回溯,钩沉了一些易被忽视的针灸发展的时代特征,对于出土器物的功用判断,愈加冷静与慎重;从针灸史的角度,针刺器具是这部历史的形象具现,每一次的革新,都象征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波动,从中能够看出,针术与灸术本身,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舞台上的博弈,对器具的弃用和推崇,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代对体表疗法的耐受程度和安全上的认可情况,相对客观地呈现出针灸术的兴衰;在针灸理论方面,针灸器具的精细确实使更精确的理论革新成为可能,如愈渐密集的腧穴定位等,而器具的效用也在让人们不断反思理论与实践是否脱节,辨析理论的性质和实用价值,并在面对新疗法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判断,不断思考“针灸学”的学科范畴,构建更理性的针灸学理论框架。

4 结论

如果把古今用于针灸疗法的器物仅作为器物本身对待,就仿佛游览博物馆而走马观花,仅看到古今之较,同与不同。而人们更关注的是,在这种同与不同之中,思考针灸发展至今何以如此,反思当下所用,判断未来的研究取向与价值。应该说,针具与灸具的每一场沿革,都是复杂的,出于偶然的契机与必然的发展,出于对人文的关怀与对科技的渴望,出于在面对国际评判中稳固立命的传统,也出于在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冲击下一次次自我的怀疑与证明。针灸的器具沿革,伴随着针灸学发展至今的历史,在并不起眼的角落,发生着一系列理

论与实践的较量。可以看到,在针灸器具的现代发展阶段有着明显科学化、标准化取向,但值得庆幸的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在历史的波澜中逐渐西化,但针灸器具却相对延续了基本的传统,甚至愈渐凸显“中国化”的复兴趋势。尽管针灸器具的施术过程中,亦采纳了西方医学的优势,如对消毒的重视,对操作环境的规范等,但仍是根基未变,方法主体仍是银针数支、艾绒一撮。即使如针刀一类与西医外科原理相近的技术,也仍然持守在传统的领域中,焕发着新生。中医与西医是思维、观念和话语上都难以相融的两种医学体系,针灸器具的历史与现状,似乎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的案例和角度,这种中西医学的“结合”,实际更有可能、也更适合以各取所长,融洽共存的形式实现。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朱兵. 系统针灸学: 复兴“体表医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Zhu Bing. Systematic Acupuncture: The renaissance of Surface Medicine[J].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5.
- [2] 徐文斌, 李素云, 徐青燕, 等. 浅说针灸器具的发展演变[J]. 针刺研究, 2010, 35(6): 474-477.
Xu Wenbin, Li Suyun, Xu Qingyan, et al.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u-moxibustion implements[J]. Acupuncture Research, 2010, 35(6): 474-477.
- [3] 陶清. 针灸技术史论[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
Tao Qing. Technical history of acupuncture[D].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8.
- [4] 甄雪燕. 古代的医疗器具[J]. 中国卫生人才, 2018(12): 86-87.
Zhen Xueyan. Ancient medical instruments[J]. Chinese Source Human Resources, 2018(12): 86-87.
- [5] 小曾戸洋, 天野陽介. 針灸の歴史: 悠久の東洋医術[M]. 東京: 大修館書店, 2015.
Kosoto Hiroshi, Amano Yousuk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Ancient Asian medicine[M]. Tokyo: Taishiyukan Bookstore, 2015.
- [6] 吴建丽, 于致顺, 魏庆双, 等. 浅谈“医工结合”对针灸针

- 具改革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2): 5409-5411.
- Wu Jianli, Yu Zhishun, Wei Qingshuang, et al. Influence of 'combining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on refor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s needles[J].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8, 33(12): 5409-5411.
- [7] 盛张倩, 许军峰. 古今针具的发展对针刺治疗的影响[J]. 湖南中医杂志, 2018, 34(3): 124-125.
- Sheng Zhangqian, Xu Junfeng. Influences on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development of needling instrument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J]. Hun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8, 34(3): 124-125.
- [8] 赵京生. 针灸关键概念术语考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 Zhao Jingsheng. Textual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f core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J].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2.
- [9] 张立剑. 朱璉与针灸[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 Zhang Lijian. Zhu Lian and acupuncture[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5.
- [10] Arya P Y, Hofer(editor) T. Bodies in balance: The art of tibetan medicine[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 [11] 朱兵. 关于灸材和灸温的思考[J]. 针刺研究, 2018, 43(2): 63-67.
- Zhu Bing. On the considerations about heating materials and temperature of moxibus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J]. Acupuncture Research, 2018, 43(2): 63-67.
- [12] 周丹, 李桂兰, 郭义. 中国灸具发展简史[J]. 针灸临床杂志, 2008, 24(12): 37-38.
- Zhou Dan, Li Guilan, Guo Yi.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oxibustion instruments[J]. Journal of Acupuncture Clinic, 2008, 24(12): 37-38.
- [13] 齐丽珍, 马晓芑, 洪珏. 古今灸材及灸法的比较[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3, 31(11): 2349-2354.
- Qi Lizhen, Ma Xiaofan, Hong Yu. Comparison of moxibus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J]. Chinese Archi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3, 31(11): 2349-2354.

Technical evolution of acu-moxa instruments with analysis on hidden motivation and intellectual-history

JIANG Shan¹, ZHANG Shujian^{2*}, ZHAO Jingsheng³

1. Institute of Medical Humanitie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History of Medicine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The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3.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a retrospect of evolution and history of acu-moxa instruments and attempts to give an explanation of the hidden motiv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its influen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cu-moxa techniqu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Firstly, with an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reasons, the scope of acu-moxa instruments is defined. Secondly, based on an literature review, th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nd modern situation of acu-moxa instruments are summarized chronologically. With a new logic of statement, the hidden ideologic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is exhibited. Finally, three question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Were there any extractable tendencie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ruments? What were the objective motivations that resulted in the evolution and creativity of these instruments? What kind of influences might be brought to the discipline of 'acu-moxa' by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instruments? 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e open up to several ideas about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in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needling instruments; moxibustion apparatus; acu-moxa; history of medicine ●



(责任编辑 刘志远)